

一个犯罪的历史，一个目击者的证词 作者：**Victor Hugo**

第一天.....。

突击行动。第一章："安全"在1851年12月1日。

查拉斯耸了耸肩，卸下了手枪的子弹。事实上，对政变可能性的信念已经变得很丢人了。路易-波拿巴先生的这种非法暴力的假设在认真考虑后消失了。

当天的重大问题显然是德文克的选举；很明显，政府只是在考虑这个问题。至于反对共和国和反对人民的阴谋，怎么会有人预谋这种阴谋呢？哪里有人能做这样的梦呢？一场悲剧必须有一个演员，而这里肯定缺少一个演员。践踏权利，镇压议会，废除宪法，扼杀共和国，推翻国家，玷污国旗，玷污军队，收买教士和行政官，成功，胜利，治理，管理，流放，放逐，运输，毁灭，暗杀，统治，与这些同谋者一起，法律最终就像一张肮脏的腐败之床。什么！所有这些暴行都将被实施！？由谁来做呢？由一个

巨石？不，是由一个侏儒。人们对这一概念嗤之以鼻。他们不再说 "这是什么罪行！" 而是 "这是什么闹剧！" 因为他们毕竟反映了；令人发指的罪行需要身材。某些罪行对某些人来说太崇高了。一个想获得第18届布鲁梅尔奖的人必须在他的过去有阿科拉，在他的未来有奥斯特利茨。成为一个伟大的无赖的艺术并不是给予第一个来的人的。人们对自己说，这个霍顿斯的儿子是谁？他身后有斯特拉斯堡而不是阿科拉，有布洛涅而不是奥斯特利茨。他是一个法国人，生为荷兰人，归化为瑞士人；他是一个波拿巴与维胡尔杂交的人；他只是因为他的帝王姿态的可笑而被人称道，谁要从他的鹰身上拔下一根羽毛，谁就有可能在他手中找到鹅毛笔。这个波拿巴在阵列中并没有通过货币，他是一个假的形象，与其说是铅，不如说是金，而且法国士兵肯定不会为这个假的拿破仑在叛乱、暴行、屠杀、暴行、叛国中给我们找钱。如果他想要赖，那就会流产。没有

一个军团会蠢蠢欲动。此外，他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

企图？毫无疑问，他有其可疑的一面，但为什么要认为他是一个绝对的恶棍？这种极端的暴行是他无法做到的；他在身体上无法做到，为什么要判断他在道德上能够做到？他没有保证过荣誉吗？他不是说过："在欧洲没有人怀疑我的话吗？"让我们无所畏惧。对此，我们可以这样回答：犯罪不是在大范围内就是小范围内发生。在第一类中，有凯撒；在第二类中，有曼德林。凯撒通过了卢比孔河，曼德林在阴沟里游荡。但聪明的人插话说："我们不是被冒犯性的猜想所影响吗？这个人已经被流放，而且很不幸。流放会使人清醒，不幸会使人改正"。路易-波拿巴则提出了强烈的抗议。对他有利的事实比比皆是。为什么他不应该真诚地行事？他已经做出了显著的承诺。1848年10月底，作为总统候选人，他在Rue de la Tour d'Auvergne大街37号拜访了一位人士，他对这位人士说："我想和你做个解释。他们诽谤我。我给你的印象是一个疯子吗？他们认为我想

让拿破仑恢复活力。有两个人

一个伟大的野心可以把拿破仑和华盛顿作为其榜样。一个是天才的人，另一个是美德的人。说'我将成为一个天才的人'是可笑的；说'我将成为一个美德的人'是诚实的。这其中哪一个取决于我们自己？哪一个可以靠我们的意志完成？成为天才？不，要成为正直的人？是的。天才的实现是不可能的，而正直的实现是有可能的。那我能使拿破仑恢复什么呢？只有一件事--犯罪。这真是一个值得期待的雄心壮志！为什么我应该被认为是男人？共和国已经建立，我不是一个伟人，我不会模仿拿破仑；但我是一个诚实的人。我将模仿华盛顿。我的名字，波拿巴的名字，将被刻在法国历史的两页上：第一页上有犯罪和荣耀，第二页上有正直和荣誉。而第二页也许会比第一页更有价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拿破仑是更伟大的，那么华盛顿就是更好的人。在有罪的英雄和好公民之间，我选择好公民。这就是我的志向。"从1848年到1851年过去了三年。人们早就怀疑路易-波

拿巴；但长期以来.....

持续的怀疑会使人的智力变得迟钝，并因毫无结果的惊恐而使自己疲惫不堪。路易-波拿巴曾有过马格纳和鲁赫这样虚伪的大臣；但他也有过莱昂-福舍尔和奥迪隆-巴罗这样直率的大臣；最后这些人都肯定他是正直和真诚的。有人看到他在哈姆的门前捶胸顿足；他的养姐霍坦斯-科努夫人给米罗斯劳斯基写信说："我是一个好的共和党人，我可以为他回答。"他在哈姆的朋友，佩奥格，一个忠诚的人，宣称："路易-波拿巴没有能力叛国"。难道路易-波拿巴没有写过题为"贫民主义"的作品？在爱丽舍宫的亲密圈子里，波托基伯爵是共和党人，德奥赛伯爵是自由党人；路易-波拿巴对波托基说："我是民主派的人，"对德奥赛说："我是自由派的人。"杜哈雷侯爵反对政变，而杜哈雷侯爵夫人则赞成政变。路易-波拿巴对侯爵说："不要害怕"（他确实对侯爵夫人轻声说过："让你的头脑轻松点"）。议会在这里和那里表现出一些不安的症状后。

变得平静了。诺伊迈尔将军，"他是值得信赖的，"他从他在里昂的位置出发，在必要时将向巴黎进军。昌加尼耶感叹道："人民的代表，在和平中审议。甚至连路易-波拿巴本人也说过这样的名言："我认为任何一个用武力改变法律规定的人都是我国家的敌人。"此外，军队就是"武力"，而军队拥有领导人，那些受人爱戴和胜利的领导人。拉莫里西埃、昌加尼埃、卡瓦尼亚克、勒弗洛、贝多、沙拉斯；谁能想象非洲的军队会逮捕非洲的将军们？1851年11月28日星期五，路易-波拿巴对米歇尔-德-布尔热说："如果我想做错事，我不能。

昨天，星期四，我邀请了巴黎驻军的五位上校到我的餐桌前，我突发奇想，想逐一询问他们。五个人都对我说，军队绝不会发动政变，也不会攻击议会的不可侵犯性。你可以告诉你的朋友这一点。"--"他笑了，"米歇尔-德-布尔热放心地说，"我也笑了。"在这之后。

米歇尔-德-布尔热在《论坛报》上宣称："这就是适合我的人。"同年11月，一份被指控诽谤共和国总统的讽刺杂志因一幅描绘射击馆和路易-波拿巴以宪法为目标的漫画而被判处罚款和监禁。内政部长莫里尼在总统面前的议会上宣称，"公共权力的监护人绝不应该违反法律，否则他就会成为.....""一个不诚实的人"，总统插话道。所有这些话和所有这些事实都是众所周知的。政变在物质上和道义上的不可能性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。激怒国民议会！逮捕众议员逮捕众议员！多么疯狂的行为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，长期保持警惕的查拉斯卸下了他的手枪。安全感是完全的、一致的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中仍有一些人在议会中保留了一些疑虑，他们偶尔会摇摇头，但我们被看成是傻瓜。第二章。巴黎睡了--钟声响了 2 日

1851年12月，上索恩省的韦尔西尼代表。

住在巴黎Léonie街4号，他正在睡觉。他睡得很香；他一直工作到深夜。凡尔赛尼是个三十二岁的年轻人，五官端正，肤色白皙，精神矍铄，思想倾向于社会和经济研究。他在阅读巴斯蒂亚的一本书中度过了夜晚的头几个小时，他在书中做了旁注，并把书放在桌子上打开，睡着了。突然间，他被一阵急促的铃声惊醒了。他惊讶地站了起来。天亮了。当时大约是早上七点。他没有想到这么早来访的动机是什么，还以为是有谁认错了门，他再次躺下，准备继续睡觉，这时第二声铃响，还是比第一声响，把他完全惊醒了。他穿着睡衣起身，打开了门。Michel de Bourges和Théodore Bac进来了。米歇尔-德-布尔热是维西尼的邻居；他住在米兰街16号。泰奥多尔-巴克和米歇尔脸色苍白，显得非常激动。"韦尔西尼，"米歇尔说，"马上穿上衣服--伯恩刚刚被人发现了"

逮捕。""呸！"韦尔西尼叹道。"毛金的事又开始了吗？""不只如此，"米歇尔回答。"鲍恩的妻子和女儿半小时前来找我。他们叫醒了我。今天早上六点，鲍恩在床上被捕。""这意味着什么？"韦尔西尼问。钟声再次响起。"这可能会告诉我们，"米歇尔-德-布尔热回答。韦尔西尼打开了门。是皮埃尔-勒弗朗克代表。事实上，他带来了谜团的解决方案。"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？"他说。"是的，"米歇尔回答。"鲍内被关进了监狱。""被囚禁的是共和国，"皮埃尔-勒弗朗克说。"你看过标语牌了吗？""没有。"皮埃尔-勒弗朗克向他们解释说，此刻墙上挂满了标语牌，好奇的人群正蜂拥而至阅读这些标语牌，他在他的街道拐角处瞥见了其中一张标语牌，而这一击已经落下。"打击！"米歇尔叹道。"不如说是犯罪。"皮埃尔-勒弗朗克补充说，有三张标语牌，一张是法令，两张是公告，三张都是白纸，贴在一起。法令是用大字印刷的。前者

和米歇尔-德-布尔热一样住在附近（Cité Gaillard第4号）的制宪者莱萨克也进来了。他带来了同样的消息，并宣布了在夜间进行的进一步逮捕。一分钟都不能耽误。他们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住在Boursault街的左派任命的议会秘书Yvan。必须立即召开会议。必须警告那些仍然逍遥法外的共和党代表，并毫不拖延地把他们召集起来。韦尔西尼说：“我去找维克多-雨果。”当时是早上八点。我已经醒了，正在床上工作。我的仆人进来了，带着惊恐的神情说：“一位人民代表在外面，他想跟您说话，先生。”“是谁？”“韦尔西尼先生。”“带他进来。”凡尔赛尼进来了，他告诉了我事态的发展。我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。他告诉我在前议员莱萨克的房间里“开会”的事。我说：“你马上去通知其他代表，”他离开了我。

第三章。夜里发生的事情

在1848年6月那段致命的日子里，荣军院的露天广场被划分为八块巨大的草地，周围有木制栏杆，被围在两片树林之间，中间有一条垂直于荣军院正面的街道。这条街道被三条与塞纳河平行的街道所穿过。这里有大片的草坪，孩子们经常在上面玩耍。八块草地的中心被一个基座破坏了，在帝国时期，基座上有从威尼斯带来的圣马可铜狮；在复辟时期，基座上有路易十八的白色大理石雕像；在路易-菲利普时期，基座上有拉法耶特的石膏像。

由于制宪会议宫在1848年6月22日几乎被一群叛乱分子占领，而附近又没有兵营，卡瓦尼亚克将军在离立法宫三百步远的地方，在荣军院的草皮上，建造了几排长条形的小屋，草皮下面藏着。这些木屋可以容纳三四千人。

在这里，特别任命的负责监视国民议会的部队住了下来。

1851年12月1日，住在滨海大道上的两个军团是第6军团和第42军团，第6军团由12月2日之前就很有名的加德伦斯-德-博伊斯上校指挥，第42军团由埃斯皮纳斯上校指挥，他从那一天起就很有名了。议会宫的普通夜卫队由一个步兵营和30名炮兵组成，还有一名上尉。此外，陆军大臣还派了几名士兵来维持秩序。两门迫击炮和六门大炮，以及它们的弹药车，被安排在位于荣军院右侧的一个小广场院子里，这个院子被称为 "加农院"。少校是皇宫的军事指挥官，他被置于探索者们的直接控制之下。夜幕降临时，栅栏和门都被固定住了，哨兵被派上了用场，并向哨兵发出了指示，宫殿就像一座堡垒一样被关闭了。口令与巴黎广场上的一样。由总统府制定的特别指示

任务人员禁止除值班团以外的任何武装力量进入。12月1日和2日晚上，立法宫由42军的一个营守卫。12月1日的会议非常平和，一直在讨论市政法，但很晚才结束，并以法庭投票结束。当探索者之一巴兹先生登上法庭，准备投下他的一票时，一位属于所谓 "爱丽舍银行 "的代表走近他，用低沉的语气说："今晚你会被带走的。"诸如此类的警告每天都有，正如我们已经解释过的，人们对这些警告置若罔闻。然而，在会议结束后，探长们立即派人去找议会的警察特别委员，杜平总统也在场。当被问及时，警察局长宣称，他的代理人的报告表明 "死一般的平静"--这是他的表达方式，并且确信当晚没有任何危险可言。当调查员们进一步追问他时，总统说

杜平感叹道："呸！"离开了房间。在同一天，即12月1日，下午三点左右，当勒弗洛将军的岳父穿过托尔托尼门前的林荫道时，有人迅速从他身边经过，在他耳边说了这样一句重要的话："11点，午夜"。这件事在魁北克市没有引起什么注意，有几个人甚至还笑了起来。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。

然而，在上述时间过去之前，勒弗洛将军不会去睡觉，他一直呆在魁北克的办公室里，直到凌晨将近一点钟。议会的速记部门是由隶属于《Moniteur》的四名信使在门外完成的，他们受雇将速记员的稿件送到印刷厂，并将校样带回议会宫，由希波吕特-普雷沃斯特先生对其进行校正。

M.伊波利特-普雷沃斯特（Hippolyte Prévost）是速记人员的主管，并以此身份在立法宫拥有公寓。他同时也是《消息报》音乐版的编辑。12月1日，他去了歌剧院。

普雷沃斯特先生在喜剧院为一个新作品的第一次演出做准备，直到午夜之后才回来。《Moniteur》的第四位信使拿着最后一张坐席的证明在等他；普雷沃斯特先生修改了证明，信使被送走了。这时已经过了一点钟，周围非常安静，除了卫兵之外，宫里的人都在睡觉。到了晚上这个时候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。议会卫队的上尉副官来到少校面前，说："上校让我来的，"他按照军事礼仪补充道："你能允许我去吗？"司令官感到很惊讶。"去吧，"他有些尖刻地说，"但上校打扰一位正在执勤的军官是不对的。"一名守卫的士兵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就听到司令官来回踱步，并喃喃自语了好几遍："他到底想怎么样？"半小时后，副官长回来了。"好吧，"司令官问道，"上校找你干什么？""没什么，"副官回答说，"他想把明天的命令交给我。

职责。"夜晚变得更深了。临近四点时，副官长又来找少校。

"少校，"他说，"上校要找我。""又来了！"司令官感叹道。

"这越来越奇怪了；尽管如此，去吧。"少校副官的职责之一是向哨兵下达指令，因此有权力撤销这些指令。副官长一出去，少校就开始不安起来，认为他有责任与皇宫的军事指挥官沟通。他上楼去了指挥官--尼奥尔斯中校的公寓。尼奥尔斯中校已经上床睡觉了，随从们也都回到了阁楼上的房间。少校刚到皇宫，在走廊里摸索着，对各个房间知之甚少，他在一扇在他看来是军事指挥官的门前按了一下。没有人应答，门也没有被打开，少校回到了楼下，却没能和任何人说话。副官长则再次进入宫殿，但少校没有再见到他。副官仍旧留在宫内的栅栏门附近。

勃艮第广场，他披着斗篷，在院子里来回走动，好像在等什么。在穹顶大钟发出五点声音的瞬间，睡在荣军院前的小屋营地里的士兵们突然被惊醒了。小屋里有声下气地命令他们拿起武器，保持沉默。不久之后，两个团背着背包向议会宫行进；他们是第6团和第42团。5点整，在巴黎的所有地区，步兵们在他们的上校的带领下，从每个营房里无声无息地走出来。路易-波拿巴的副官和勤务人员被分配到所有的军营中，他们监督了这次拿起武器的行动。骑兵们在步兵之后四分之三小时才开始行动，因为他们担心马蹄声在石头上的响声会过早地惊醒沉睡的巴黎。德-佩尔西尼先生从爱丽舍宫给荣军营带来了拿起武器的命令，他在埃斯皮纳斯上校的身边，走在第42军团的前面。军队中流传着一个故事，因为

在今天，尽管人们对不光彩的事件感到厌倦，但对这些事件的叙述仍有一种阴郁的冷漠--现在有一个故事：在与他的军团出发的时刻，有一位可以说出名字的上校犹豫了，爱丽舍的使者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一个密封的包，对他说："上校，我承认我们在冒很大的风险。在这个信封里，我受命交给你的是十万法郎的钞票，以备不时之需。"信封被接受了，该团就出发了。12月2日晚，上校对一位女士说："今天早上我赚到了10万法郎和我的将军肩章。"这位女士给他指了指门。向我们讲述这个故事的格扎维埃-杜里厄（Xavier Durrieu）后来很好奇地去见了这位女士。她证实了这个故事。是的，当然！她当着这个卑鄙小人的面关上了门；一个士兵，一个敢于拜访她的旗帜的叛徒！这就是她的故事。

她会接受这样一个人吗？不！她不能这样做。"而且，"格扎维埃-杜里厄说，她还说，"然而，我没有性格可言。"另

一个神秘事件正在进行中，地点是在法国巴黎。

警察。那些在深夜才回家的城市居民可能已经注意到，大量的街头出租车在耶路撒冷街附近的不同地点零散地游荡。从晚上**11**点开始，以热那亚和伦敦的难民抵达巴黎为借口，担保人大队和八百名军士被保留在县里。凌晨三点，一张传票被送到了巴黎和郊区的四十八位专员以及治安官那里。一小时后，他们全部到达。他们被带入一个单独的房

间，并尽可能地相互隔离开来。五点钟时，省长办公室里响起了钟声。省长**Maupas**把警察局长们一个接一个地叫到他的办公室，向他们透露了这个阴谋，并把他的那部分罪行分配给了每个人。没有人拒绝；许多人感谢他。这是一个在自己家里逮捕**78**名民主党人的问题，他们在自己的地区很有影响力，而且被爱丽舍视为可能的街垒头目而感到害怕。这也是